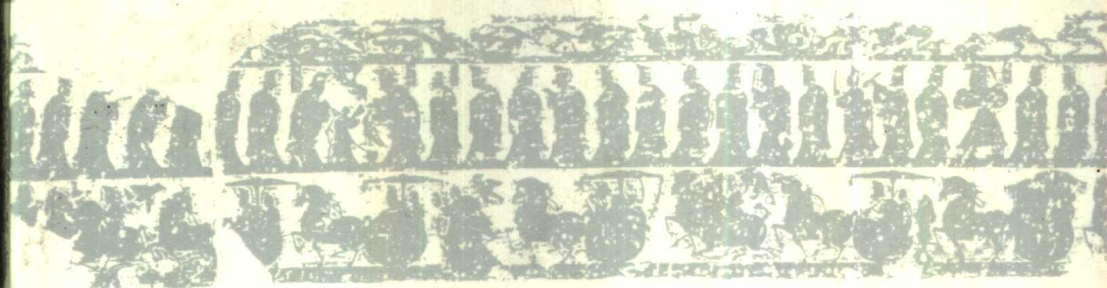


李 启 谦 著
齐 鲁 书 社

李 启 谦 著
齐 鲁 书 社

ON THE
DISCIPLES OF
CONFUCIAN

孔门弟子研究



生的人就又多出三
人。即达到八十人。
另外。在其他资料中发现，
还有十七人也很像
全是孔门弟子。如果
全加在一起，弟子
总数就有十七人。

有七十四人，不同者
有三人。这样孔子学
相同时所记人名
家语·弟子解亦作七十七
弟子传作七十七人
孔门弟子之数，《史记》

ON THE

DISCIPLES OF
CONFUCIAN

孔子弟子研究

孔子弟子研究

孔子弟子研究

孔子弟子研究

孔子弟子研究



孔子文化大全

孔门弟子研究

李 启 谦 著

山东省出版总社组织出版

齐 鲁 书 社 出 版



The Complete Works of Confucian Culture

On the Disciples of Confucian

Edited by

Li Qi Qian

Organized and Published
by Shandong General Press
Published by Qi Lu Press

《孔子文化大全》
孔 门 弟 子 研 究

李 启 谦

山东省出版总社组织出版

地址：中国·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电话：610051 电报挂号：0238

*

出版：齐鲁书社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国内外总发行：中国·东方图书公司

地址：中国·山东省济南市经四路227号
电话：612539 电报挂号：0238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199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3—0022—X/K·4

47564

The Complete Works of Confucian Culture

On the Disciples of Confucian

Edited by

Li Qi Qian

Organized and Published

by Shandong General Press

Add; 39 Shengli Street, Jinan, Shandong, China

Tel; 610051

Cable; 0238

*

Published by Qilu Press

Printed by Shandong Xinhua Printing House Weifang House

Distributed by China Orient Books Company

Add; 227 Jingsi Road, Jinan, Shandong, China

Tel; 612539

Cable; 0238

*

First Published July, 1988

First Printed July, 1988

ISBN 7-5333-0022-X/K • 1

《孔子文化大全》編輯委員會

主 編 苗楓林

副主編 杜秀明 初甫川 王國華

編 委 (以姓氏筆劃爲序)

王國華 杜秀明 初甫川

李 木 李德明 宋日亭

苗楓林 孫汝泰 陳延昭

趙炳南 趙耀堂 蔣寶德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Confucian Culture”

Editor in Chief

MIAO FENG LIN

Deputy Editor in Chief

DU XIU MING

CHU FU CHUAN

WANG GUO HUA

Editorial Committee Members

(according to the
sequence of names'
strok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WANG GUO HUA

DU XIU MING

CHU FU CHUAN

LI MU

LI DE MING

SONG RI TING

MIAO FENG LIN

SUN RU TAI

CHEN YAN ZHAO

ZHAO BING NAN

ZHAO YAO TANG

JIANG BAO DE

前言

——试谈孔门弟子研究

孔子研究发展到今天，孔门弟子的探讨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为了能把这一工作开展起来，愿谈点初步看法，以求有益于学术界。

一、研究的意义

孔门弟子研究，对许多学术问题的解决，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帮助，是目前学术发展中急需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

1. 是深入研究孔子和《论语》的需要。

孔子的许多社会活动，是在弟子们共同参与下进行的，要想搞清楚孔子的这些活动的时间、地点和具体情况，单从孔子本身往往不能解决；可是结合着弟子的研究，就能一目了然。如《论语·先进》中所记载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弟子各言其志的事，只要知道公西华的年龄和曾皙所说的具体内容，就可知道他们谈话的大体时间和地点。因为，公西华比孔子小四十二岁，孔子开始周游列国时，他才十二岁，这样的年龄，不可能谈什么志向。所以不可能是周游列国前说的。曾皙谈志向时说，愿意“浴乎沂”，而沂水是在曲阜城南近郊。这样看来，孔子

和四位弟子说这段话的时间，是在孔子的晚年周游列国结束后，地点就是在曲阜。

另外，也有利于了解孔子言论的具体内容。因为孔子的很多言论是在与弟子们交谈时说的，谈话的内容也往往说的是弟子们的功过是非。在这样情况下，要是能清楚了解每个弟子各个方面情况，就能更明白孔子谈话的内容。如《论语·先进》载：“子曰：‘师（子张）也过，商（子夏）也不及’。”对这几个字，历来注家不一致，也都欠说服力。如朱熹曾注解“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苟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谨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等。这一注释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子张固然有才气，而子夏的才气更高。子夏为人勇武，思想开阔，不仅有前期法家风度，而且在传授古代文献方面，成绩也最突出。所以说他在孔门弟子中是成就最大的一个（颜回也不能和子夏相比），他绝不是个规模狭隘的人。故朱注不当。然而当我们仔细了解一下子张、子夏的性格脾气和其他有关情况后，就明白这段话的具体内容了。子张是个爱说话“见面熟”的人。不论什么人他都结交，交朋友太杂乱，所以孔子说他“师也过”。而子夏是“好与贤己者处”，只想和比自己贤能的人交往，一般人他不予问津，这样他的朋友就太少了。孔子在这里说的“师也过，商也不及”，就是具体指的在交朋友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说的别的。这样，对孔子的言论和《论语》章句的解释，就具体细致得多了（详见本书《子张》部分）。类似问题很多，不必一一列举。

2. 是研究儒学发展史必需探讨的课题。

孔子是儒家学说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儒家这个社会集团的最早总首领。但是只有孔子没有孔门弟子不可能组成学派和集团，也不可能得到大的传播和发展。所以要想研究儒家学

说、学派的出现、发展,及其主要内容和社会性质,就必须在研究孔子的同时,对孔门弟子也要进行探讨。

孔子死后,儒家学说是靠孔子弟子去传播。儒家学派是由孔门弟子所组成。所以要研究孔子死后、孟子以前这段时间的儒家学说,也必须研究孔门弟子。

孔子和儒家学说包括很多内容,而孔子的弟子往往各有特长,如“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他们都有自己的特长。在攻读和传授儒家经书方面也是如此,如子夏攻《诗经》,传《春秋》。商瞿攻、传《易经》。曾子的孝行对《孝经》出世的影响等等。以上情况,对后世都发生了长远的作用。所以要想研究汉代以后的儒家思想及其演变、发展,必须探讨孔门弟子的思想。

3. 是编写孔子文艺作品的需要。

最近有很多人正在创作有关孔子的剧本和小说。任何这方面的作品,除了对最主要人物进行集中描写外,还必须有性格各异的众多人物来衬托。而历史体裁的文艺作品,又不同于一般文艺作品,对主角和其他一些重要人物的性格、思想的描写,必须有一定的历史资料作依据,否则就不是历史小说或剧本。因此,在塑造孔子形象时,除了对孔子本人进行重点了解外,对其弟子们的性格、思想和事迹也必须进行逐个地考查。

另外,对研究春秋、战国史的演变,也大有好处。

总之,不论从哪个角度讲,深入了解孔门弟子,都是十分必要和急需的。

二、历史上的研究考查

1. 历代研究的大体状况。

为了今后的需要，有必要作一历史的回顾。孔门弟子的研究，在过去很多历史时期，都曾受到过重视，而且也整理出了不少成果。战国时代的古籍，多数记有这方面的内容。最近在河北定县出土的《儒家者言》更是如此（见《文物》1981年第八期）。

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写了一篇《仲尼弟子列传》，首开孔门弟子研究之先河。后来不知何人又写了《孔子家语》二十七卷（见《汉书·艺文志》）。此书虽早已失传，但从后来三国时代王肃写的《孔子家语》新作看，原来的《孔子家语》也定会对孔门弟子进行一些介绍。

在《汉书·艺文志》中，还著录有《孔子徒人图法》二卷一书。从书名看，它确是有关孔门弟子的第一部专门综合性著作。另外，《汉书·艺文志》还录有：《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等，这些是单个弟子的著作。《艺文志》中的这些书，虽早已失传，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孔门弟子的一些书，曾流传于世，而且人们也是注意了解他们的思想和事迹的。

东汉末年郑玄辑成了《孔子弟子目录》一卷，这是著录有关孔门弟子研究的第一部书籍。它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可惜也已失传。

西汉人文翁于四川成都立学作石室，到东汉末年高朕作“礼殿”，于殿壁画各类历史人物一百六十八名，其中包括孔子七十二弟子，后人又有摹写，称《文翁礼殿图》，可见当时对孔门弟子的重视。它对考查孔门弟子的人数、姓名等，有重要参考价值。

汉末三国之际，王肃又写了《孔子家语》。此书虽不是单纯介绍孔门弟子的，但是其中大量章节是这方面的内容。如《弟子行》、《颜回》、《子路初见》、《七十二弟子解》、《曲礼子贡问》、《曲礼子夏问》、《曲礼公西赤问》等，均是专节介绍孔门弟子言行的。这可说是继司马迁后，比较全面介绍孔子弟子的一部书。

在《隋书·经籍志》中，著录有《鲁国先贤传》二卷、《曾参传》一卷、《曾子》二卷、《孔子弟子先儒传》十卷等书。这些书很可能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的，这说明该时代人们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是很注意的。

在唐代，《旧唐书·经籍志上》记有《孔子弟子传》五卷。《册府元龟》中的《崇儒术》、《崇儒》、《儒学》、《学校》等部中，有零散的介绍。《艺文英华·碑·儒》中，在颂扬孔子时，也兼及孔门弟子。《唐会要·学校》中也介绍了一些。另外，成就最大的要算是司马贞和张守节。他们通过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作的索隐、正义式的注解，对孔子弟子进行了有价值的探求。其他的有关这方面的著述，暂且不知还有多少。

到了宋代，理学流传。理学家们在著述中，曾不断提到孔门弟子的思想和事迹。汪晫还辑有《曾子》一卷。在《太平御览·人事部》的有关章节中，有不少段落谈到了这方面的内容。这部书是给皇帝看的，由此可看出当时对孔门弟子也是加以注意的。不过总起来看，唐、宋时代这方面的著作是比较少的。

在明代，此类著作逐渐增多。据不完全搜求，已知万历年间写有《圣学宗传》十八卷、《曾志》四卷，《兖州府志·圣里志》等。天启年间有《圣学嫡派》四卷、《圣门志》六卷。崇祯年间有《孔门两弟子言论翼》。具体年代不明者，还有《陋巷志》八卷、《新刻孔门儒教列传》四卷。从上面看，到了明代末年，人们对孔子弟子

的研究,又逐渐关心起来。

整个清代可以说是孔门弟子研究大盛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就有专著三十三种。如《文庙贤儒功德录》三卷、《仲里志》六卷、《圣门十六子书》、《孔门师弟年表》一卷、《圣门诸贤述略》一卷、《门人考》一卷、《文庙从祀弟子赞》一卷、《文庙从祀贤儒表》八卷、《孔门弟子考》一卷、《孔门弟子传略》二卷、《孔子门人考》、《孔子弟子考》一卷、《先贤传》、《曾子》十篇、《曾子三种》、《曾子家语》六卷、《宗圣志》、《陋巷志》、《洙泗考信余录》……等等。除以上专著外,在《阙里志》、《阙里文献考》、《类典串珠》、《曲阜县志》、《大成通志》等等书中,也有专门章节介绍孔门弟子。总之,清代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进入民国时代,西学渐进,这方面的研究也就大减。不过,有人为了保护“国粹”,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整理工作,如有人编辑出了《历代圣哲学粹前编》和《历代圣哲学粹后编》等书。尤其是在《后编》中,有两卷专门介绍了孔门弟子。后来有的学者也做过研究工作,如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中,就有《孔门弟子通考》和《宰我死齐考》等章节。在当时编纂的《续修曲阜县志》中,也列了个弟子名单。不过这既谈不上是整理,更谈不上是研究。其他著作则还有一些。

解放后,在这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

2. 对过去研究的简要评论。

过去这方面的工作,纵观其历史,可以看出有个马鞍形,而汉代和清代是两个高峰。之所以出现马鞍形,有政治原因,也有思想原因。就政治方面讲,南北朝和五代时期,战乱分裂,儒家的君君臣臣、仁爱孝悌等思想不被重视。就思想方面说,隋唐时代佛教盛行,宋朝时代儒道佛忙于合流,当时没把孔门弟子的探

求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所以中间一段时间的成果比较少些。虽然有这一情况，但总起来看，过去也是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主要者可以看出如下几点：第一，保存和整理了一些资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资料依据；第二，历代的各种注释及其不同，启发了我们的思考，帮助了我们的探索；第三，前人考证的不少结论，不仅能启发思考，而且今天看来也还是可信的，如幸我未参加田常作乱、子贡的外交活动不能使“五国各有变”等等。我们可以借用这些成果，再继续深入研究。

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第一，整理集中的材料，往往不注明出处，真假难分，使用起来不方便。而且，历朝历代所印的书，往往是内容雷同，重复劳动现象严重。第二，他们是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只要孔子称赞的，他们就认为是好的，这就失去了客观标准。如“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本是对的，可是因为孔子不同意，也就被说成是违礼的言论。第三，是以对封建统治是否有利来定是非。如曾子的“孝”达到了“愚孝”的程度，就连孔子对曾子的一些“愚孝”行为都不完全同意，可是后代封建统治者看到对维护封建统治有好处，就一再宣扬曾子，后来并被封为“宗圣”。这些都是有阶级和时代的偏见的。第四，清朝末年和民国时代，人们整理国故、宣扬国粹的目的和方法，是比较复杂的，有的是为了反清，如《国粹学刊》，有的是为了抵制西学，有的是为了对抗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前一种情况有进步性，后二种，就是保守和反动的了，而且其观点和方法也还是重复着封建时代的格调。

解放前后，在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本应取得前人所无法比拟的成果，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研究反而成了空白。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和对孔子的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总结

一下,可以看出如下几点。

“五四”运动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当然孔门弟子也在被打倒之列)。这个口号在当时是革命的,同时也起到了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作用。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是弄混乱了,其一,把孔子和反动的封建制度等同起来不对;其二,封建统治者把孔子当成“圣人”固然不对,但是,反过来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也不全面不客观。

解放后,在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孔子曾展开过自由地讨论,但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又把它的扼杀在萌芽之中。如果说“五四”时期提出的“打倒孔家店”有革命性的话,那么“十年内乱”中搞的“批孔运动”,则是十分荒谬的。

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我们应当在深入研究孔子的同时,抓紧时机把孔门弟子的研究搞上去。

三、如何进行研究

在了解和分析了过去的研究情况之后,应当提出目前和今后的研究方法和步骤来。

1. 我们应当运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和方法,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去评价人物的功过。

第一,要总结历史经验,防止两种偏向。在封建社会里,是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凡是孔子肯定的都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批孔运动”时,则又完全反过来,凡是孔子肯定的都是错的,凡是孔子否定的就认为是对的。这都把问题绝对化简单化,无益于深入研究问题。在研究孔门弟子时,也不要以孔子对弟子的肯定和斥

责来定弟子的是非，而应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对待。

第二，对封建社会提倡过的孔子及弟子的东西，要有分析地去对待，既不要简单的全面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如封建社会历代官府，都一再肯定曾子、闵子骞的孝行，极力宣扬“愚忠”、“愚孝”。他们之所以如此，当然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对此我们是反对的。但是，是否对曾、闵的“孝”就完全否定呢？不能。因为在“孝”中还有尊敬老人、照顾老人的合理的一面。

第三，在研究思想家时，过去往往按照如下格式进行，首先考查家庭成份；其次研究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再次判定唯心还是唯物；最后，对落后阶级和唯心主义的思想家大骂一顿，就算完成了研究任务。这样的方法，实在太简单化了。因为，思想家虽然有政治立场问题，但更多的是认识方面的问题。在认识领域内，在真理面前应是人人平等的，不论古今中外，也不论哪个阶级的人，只要他说得符合实际，就应肯定。如王国维，一直到1927年还看不惯留“洋头”，而自己照旧留着长辫子。他既看不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更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在革命浪潮中，他思想苦闷，就在这一年（五十一岁）投昆明湖自杀。在政治上可说是典型的保守派，然而他在中国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所取得的名闻中外的成就，同样应当给以充分的肯定。孔门弟子在家庭出身和政治态度上是有差异性的，我们在研究各位弟子的思想时，也应象对待王国维的态度那样，要有分析的对待。

2. 需要全面系统地把每个弟子的资料，分别地整理出来。

在这方面前人虽然做了一些介绍工作，但是还不全面不完整。而这一步是研究的依据，必须首先去做。另外，前人做这个工作时往往不注明资料出处，我们必须纠正这一缺点，以便在运用资料的同时，也能进行辨伪工作。在这一工作的寻求中发现，